

【原载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八辑），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0 年 4 月第一版，第 242-248 页】

## 卜凯与河北盐山县 150 农家之经济及社会调查\*

◇河北大学 杨学新 任会来

**摘要：**卜凯的河北省盐山县 150 户农家的经济及社会状况的调查是他关于中国农村调查的有机组成部分，本文认真分析了调查的成因和调查人员的组成，对调查进行了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对调查的时间、书名、地名等问题进行了说明和更正。

**关键词：**卜凯 盐山 农家 调查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兴起的调查风潮中，开展调查“历史最久，调查地域最广，调查项目最详，和比较上最富于科学性的农村调查”，<sup>1</sup>莫过于南京金陵大学农经系主任、美国人卜凯（John Lossing Buck）主持的农村农家调查，其中关于河北盐山县 150 农家之经济及社会调查在卜凯的学术生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次调查的时间为 1923 年夏天，调查成果于 1926 年 6 月在美国以英文形式发表，1929 年孙文郁翻译为中文“河北盐山县 150 农家之经济及社会调查”，并在金陵大学农林丛刊第五十一号上发表。卜凯将这次调查的一些方法和经验推广到其它地方的农家调查，并对此次调查及在其它 6 省 16 处 2736 农家调查资料进行了统计分析，1930 年由金陵大学和中国太平洋国际基金会以《中国农家经济之研究》（英文版）之名正式出版，后由张履鸾译成中文，1936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当时中国第一部研究中国农家经济学的专著。由此，卜凯也被尊为当时世界上关于中国农村经济最优秀、最权威的学者。而追溯其成果的取得，就不能不谈及他对河北省盐山县 150 户农家之经济及社会的调查。

### 一、调查的成因

卜凯 1890 年 11 月 27 日出生于美国纽约州德彻斯县快乐谷的一个农家，他的父亲是当地长老教会的长老，母亲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卜凯在农业和宗教方面深受其父亲和家庭的影响，他“通过看父亲常常订阅的农业报刊开始对科学农业和改良物种感兴趣”。<sup>2</sup>中学毕业后，进入以农科著称的美国常春藤大学之一的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就学期间，加入了芮思娄发起的中国研究俱乐部，对中国问题颇感兴趣，认为“中国人民更需要了解科学的农业”。<sup>3</sup>因此，他拒绝了印度和美国农业部的邀请，于 1915 年来到中国的安徽宿州从事农村改良和推广工作。在宿州 4 年多的工作期间，他经常与当地农民交流农业知识，帮助他们进行农业改良，还开办了关于农

---

\*本文系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农村 80 年的变迁——以河北省盐山县 150 户农家为例》（项目批准号：HB07BSH0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sup>1</sup>钱俊瑞：《评卜凯教授所著〈中国农场经济〉》，《钱俊瑞选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 181 页

<sup>2</sup>② John Lossing Buck: 《The following is an interview with DR. John Lossing Buck held at his residence at Pleasant Valley, New York, on sept. 21, 1962. 》，未刊，第 2 页。

<sup>3</sup>同上，第 6 页。

业知识、技术的短期培训班，他将主要工作精力用于农业改良而不是传教上。但由于两国的国情不同，再加上中国农村的落后、农业的凋敝和农民的贫困，使他“很难找到切实可行的办法来帮助中国农民，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点越来越明显了”。<sup>4</sup>在这种情况下，1921年他接受了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院长、康奈尔大学的校友芮思娄（J. H. Reisner）的邀请到金陵大学农学院任教。

在教学中，他感到自己所选用的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材对中国学生很不适应，与中国农村农家的实际状况差距很大，不适宜教学，但又没有其它教材可以利用，而且“中国是一个没有可靠典型统计数量的国家”，<sup>5</sup>急需大量真实反映当时中国农村与农民生活实际状况的数据资料，因此，他要求学生读完他所教授的农业经济学、农村社会学、农场管理学与农村工程学四门课程后，必须选定一个暑假完成至少一百个农家的经济和社会状况调查，对于开展农村调查的学生，给予一定的学分，还“对家在农村，能在暑假至少调查一百个农场进行农场分析的大学生给予了一定的经费资助”。<sup>6</sup>希望通过这些农家调查活动，以反映中国农村农家的真实状况，其中盐山150户农家经济及社会调查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调查之所以选择在河北省盐山县的三个村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直接调查者卜凯的学生崔毓俊的农民出身。崔毓俊被卜凯视为“农场管理班上唯一从农村来的学生”，<sup>7</sup>符合他“善能与农民接近”，有过“与农民经过长时间的共同生活的经历”<sup>8</sup>，知道怎样与农民进行交流，开展农家调查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是进行农家调查最佳人选。第二个便是出生地、近邻和交通便利方面的原因，崔毓俊为盐山县吴家庄人，吴家庄位于县城东2里，是崔毓俊的出生地，乡里乡亲，有诸多便利条件。郭家庄位于县城东北5里，与吴家庄是邻村，地与地相连，亲朋多，特别是还有崔毓俊要好的发小同学，走访方便。杨帽庄位于县城南18里，紧邻公路，交通方便。第三个原因是他们有共同宗教信仰。笔者在搜集资料和走访三个村庄的长者时发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吴家庄和杨帽庄是天主教徒比较多的地方，杨帽庄还建有一所教会小学，是当时附近农庄小有名气的“文化村”，共同的宗教信仰是调查村庄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至今盐山县城还保留沧州东部地区唯一的一座1903年建立的天主教堂。

此外，1920年华北大旱，国内中外人士在北京发起成立了“华北华洋义赈会”开展放赈救灾工作，1921年，当救灾工作告一段落后，该会将赈灾余款的四分之三捐赠给金陵大学农学院，同时要求该校将农业改良和推广工作的重点放在华北，其调查后期统计工作的经费资助也来源于此组织，它为调查提供了资金保障，这无疑也是此次盐山调查得以顺利完成不可或缺的原因之一。

## 二、调查的人员

根据盐山县150户农家经济及社会调查的状况分析，参加调查的人员主要分为三类，即主持人和指导教师为卜凯教授，直接调查者为学生崔毓俊以及协助调查的“开通的小学教员”、“村董”、“亲友”等。卜凯教授主要负责调查数据统计整理、

---

<sup>4</sup> [美]赛珍珠著，尚营林等译：《我的中国世界》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149页。

<sup>5</sup> John Lossing Buck: 《The following is an interview with DR. John Lossing Buck held at his residence at Pleasant Valley, New York, on sept. 21, 1962.》，未刊，第25页。

<sup>6</sup> Randle Stross: 《The Stubborn Earth—American Agriculturalists on Chinese Soil, 1898-1937》，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1986年，第5页。

<sup>7</sup> 崔毓俊：《忆往拾遗》，未刊，1993年10月，第50页。

<sup>8</sup> 卜凯著，张履鸾译：《中国农家经济》，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4页。

审核和分析工作。直接调查者为崔毓俊，他走访农家，填写调查表，崔毓俊曾在金陵大学农学院卜凯教授的办公室做统计工作，“一连三年，直到毕业为止。”<sup>9</sup>这些实际工作经验为他的盐山 150 户农家经济及社会调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协助调查者为“开通的小学教员”、“村董”、“亲友”等，他们主要是开展解释、说服和开导工作，针对调查过程中农民思想中出现的诸如“加捐、收买土地”等疑虑问题，则“先与较开通之小学教员及村董等，详细解释其用意，使之无所怀疑。然后再由小学教员及村董等，辗转向农民解释开导，如是则农民之误会，大半免除，而其真相可见矣。”<sup>10</sup>可见这三类人员的分工合作是盐山 150 农家调查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

### 三、调查的评价

对卜凯中国农村调查的评价，国外一直持比较肯定的态度，国内则经历了对其褒少贬多到褒多贬少的过程，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近年来对其农村调查予以正面肯定的成果不断出现，在此不再赘述，但对于盐山 150 农家调查，应突出强调以下几点：

1. 此次调查所采用的理论体系以及调查内容和方法较前面调查更加成熟和完善。如芜湖调查基本上按各小类划分，主要涉及农场组织经营方面的内容，而盐山调查不仅进一步完善了这方面的内容，还加入了农家与人口以及其它社会经济问题的调查，并且没有了那么多“晦涩难懂的沃伦式”的语言，更符合中国农村农家的实际，为后来进行的中国农家经济和土地利用调查提供了借鉴。

2. 此次调查是卜凯学术生涯的重要起点。盐山县 150 农家经济及社会调查是在三个村庄进行的，被调查的农家分别占三个村庄农家总数的 92.39%、45.67%、50%。使用了 150 份农家调查表，每份包括实例调查表 14 种。在资料整理过程中，共汇总统计表 64 种，图片 24 张。可以说内容设计缜密，统计认真、细致，资料较为详实和准确，结论也不失为公允，将经济及社会内部各因素关系一一呈现在我们面前，对国内外了解、研究中国农村农家经济与社会状况提供了第一手的重要资料，卜凯教授的硕士论文就是在此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写成的，并成为他的博士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

3. 这一调查体现了他在中国南北方农村农家调查研究中的互补性。卜凯来到中国后，一直在中国的南方如安徽、江苏等地从事农业知识传播、改良以及农家经济和社会状况的调查工作，而对中国北方农村了解的却相对较少，河北盐山县 150 农家之经济及社会调查无疑使他工作和学术研究的范围扩展到中国的北方，因为中国是一个地区之间差异非常典型的国家，中国南北方农家经济及社会状况调查的开展，可以更加客观真实的反映中国农村农家的现状，同时也是卜凯学术研究日趋成熟的重要体现。

4. 卜凯对发展中国农村农家经济和改良农村生活状况提出了一些前瞻性的建议。如针对中国田地分散的状况，提出发展大农场、适度规模经营；针对田场面积较小的状况，提出移民、发展工商业、改良农业生产、提高单位产量；针对当时的农村发展和出现的各种灾害，提出控制人口、保护生态环境等。这些建议虽然没有引起当时中国政府的重视，但具有科学的预见性和前瞻性，对今天我国所倡导的计划生育、发展乡镇企业、解决“三农”问题、建设文明生态村等无疑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这也是他的农村农家经济和社会调查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的原因所

---

<sup>9</sup>崔毓俊：《忆往拾遗》，未刊，1993 年 10 月，第 21 页。

<sup>10</sup>卜凯著，孙文郁译：《河北盐山县一百五十农家之经济及社会调查》，民国十八年刊印（1929 年），第 4 页。

在。

#### 四、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

1. 关于此次调查人员选择的偶然性、地点选择的局限性以及调查数据的客观真实性问题。这次调查是以学生崔毓俊的作业而出现的，同期开展调查的学生还有另外5人，之所以选择崔毓俊的调查结果单独出版，并没有进行事前的计划和安排，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可以说具有一定的偶然性；调查的地点选择完全取决于学生崔毓俊自己的意志，根据他对家乡农庄熟悉的情况、了解的程度和交通状况而定；而被调查的“盐山县实为中国寒苦之农区”，<sup>11</sup>三个村庄位于盐山县的西部，“惟若以全县而论，西部实为盐山最肥富之农区”，<sup>12</sup>是经济状况相对较好的，而东部盐碱地多、比较贫瘠的村庄则没在调查之列，使得此次调查的数据的典型性受到一定程度的质疑；另外，此次调查的对象是我国华北地区比较贫困乡村的贫苦农家，加上自1920年以来该县持续三年的旱灾和当时河北省境内连续三次的军阀混战造成的社会动荡不安，农民对调查人员和内容有所畏惧，对回答的问题有所保留，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本次调查数据的准确性。我们在引用这次调查的数据时应充分注意到这些问题。

2. 盐山150农家经济及社会调查的准确时间应为1923年暑假。卜凯教授称此次调查日期：“自民国十一年四月一日起至十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1922年4月1日—1923年3月31日）<sup>13</sup>，民国二十五年八月出版（1936年）的、卜凯教授所著的《中国农家经济》一书第一表中也写到，河北省盐山150农家的调查日期为“1922年4月—1923年3月”，充分证实了他关于调查日期为“1922年4月—1923年3月”的说法。但根据这次调查的直接调查者崔毓俊在其《忆往拾遗》中的回忆，他是于1922年夏天毕业于北京燕京大学预科的，1922年秋季入学到金大农科学习，并多次提到于1923年夏天回乡进行调查，由此我们可以推算，此次调查的准确时间应为1923年暑假。

3. 关于同一成果名称不同的问题。1923年此次调查进行时，盐山县隶属于直隶省，因此，1926年该书在美国以英文刊印时以直隶省相称。1928年直隶省改为河北省，1929年中文版刊印时，改称为河北省盐山县，因而出现了同一书英文、中文版本名称不同的问题。

4. 关于被调查三个村庄的行政归属和名称问题。民国十八年刊印的（1929年）《河北盐山县一百五十农家之经济及社会调查》中提到，“本调查所及之三村皆属班吴镇”<sup>14</sup>。笔者查阅了民国五年（1916年）贾恩绂先生编纂的《盐山新志》及相关的历史档案资料，并走访了当地仍健在的长者，证实当时盐山县设5区29铺，吴家庄、郭家庄隶属于“边务铺”<sup>15</sup>，杨帽庄隶属于“帽圈铺”<sup>16</sup>，“三村皆属班吴镇”之说有误，“班吴镇”应为“边务铺”。关于此次被调查三个村庄的名称。民国十八年刊印的（1929年）《河北盐山县一百五十农家之经济及社会调查》中三个村庄翻译为：吴家庄、郭家庄和杨帽庄，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

---

<sup>11</sup>卜凯著，孙文郁译：《河北盐山县一百五十农家之经济及社会调查》，民国十八年刊印（1929年），第4页。

<sup>12</sup>同上，第4页。

<sup>13</sup>卜凯著，孙文郁译：《河北盐山县一百五十农家之经济及社会调查》，民国十八年刊印（1929年），第1页。

<sup>14</sup>同上，第140页。

<sup>15</sup>贾恩绂：《盐山新志》（志卷四），民国五年（1916年），第9页。

<sup>16</sup>同上，第7页。

农家经济》一书中三个村庄则翻译为：吴家、郭家和杨帽，两种资料三个村庄的名称虽然不一致，但只是翻译上的详和略，没有大的差别。而实际上，当时的杨帽庄和现在村的名称都称为“杨帽圈”，而不是“杨帽庄”。“郭家庄”当时包括邵郭庄、魏郭庄、李郭庄、邓郭庄四个村庄，此次调查资料中的“郭家庄”应该是四个村庄的合称。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卜凯先生之子 Paul L.Buck 博士、崔毓俊先生之子崔肇春教授和浙江大学张蔚文教授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在此一并感谢！）

#### 参考文献：

John Lossing Buck (1962): The following is an interview with DR.John Lossing Buck held at his residence at Pleasant Valley, New York, on sept. 21,1962.。未刊。

Randalle Stross(1986): *The Stubborn Earth—American Agriculturalists on Chinese Soil,1898-1937*,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美]赛珍珠 (1991): 《我的中国世界》，尚营林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

卜凯 (1929): 《河北盐山县一百五十农家之经济及社会调查》，孙文郁译。金陵大学农林丛刊第五十一号。

卜凯 (1936): 《中国农家经济》，张履鸾译。商务印书馆。

崔毓俊 (1993): 《忆往拾遗》。未刊。

贾恩绂 (1916): 《盐山新志》(志卷四)。